



四川藏学研究

(三)

杨岭多吉 主编
四川藏学研究书院编

四川民族出版社

四川 藏学研究

(三)

主编 杨岭多吉

副主编 罗润苍

刘 汉

何盛明

四川藏学研究书院编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5 · 成都

(川)新登字 002 号

责任编辑：李培英
封面设计：蒋光年
技术设计：杨 潮

四川藏学研究
(三)

主编 杨岭多吉
副主编 罗润苍 刘 汉 何盛明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郫县犀浦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3 插页 2
1995年5月第一版 1995年5月第一次印刷
字数 260 千 印数 1—2000 册

ISBN7-5409-1446-7/G. 650 定价：8.90(平)元
11.90(精)元

目 录

论构成吐蕃王朝东向扩张的中原凝聚

 力因素 石 硕 (1)

略论吐蕃时期墓葬的器物随葬制度 霍 姚 (19)

西藏山南穷结家族概述 陈庆英 马 林 (47)

甘孜孔萨土司家族史略 孔萨益多 (79)

论康区民族史中的几个问题 任新建 (106)

略论元代藏汉民间互市 陈汎舟 (134)

对《格萨尔史诗》的几点研究探析 肖崇素 (151)

历史不容篡改 李茂郁 (169)

——驳范普拉赫的种种谎言

达赖喇嘛封印考 欧朝贵 (254)

把握机遇 继往开来 罗润苍 (270)

——兼论藏传佛教在当代藏族社会中的位置

藏兽医药的发展概况及展望 张兴乾 张辉煊 (285)

| | | |
|---------------------------------|-----|-------|
| 对加快发展我省藏区教育几个问题 的探讨 | 周成厚 | (295) |
| 我国老一辈藏学家谢国安 | | |
|刘立千 陈宗祥 任新建 | | (311) |
| 藏学耆宿刘立千 | 杜永彬 | (323) |
| 雍仲本教大藏经目录 | 刘立千 | (329) |
| 藏族史齐乐明镜（续完） | | |
|毛尔盖·桑木丹 著 赞拉·阿旺措成 余万治 译 | | (354) |

论构成吐蕃王朝东向扩张的 中原凝聚力因素

石 硕

对于藏民族的发展来说，公元7~9世纪的吐蕃王朝时代可以说是一个极为辉煌的时代，它也是藏民族形成共同地域并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获得巨大发展的时代。因此，吐蕃王朝的出现标志着西藏乃至青藏高原历史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这正如范文澜先生所言：“原来寂寞无所闻的中国广大西部，因强有力的吐蕃的出现，变得有声有色了。”⁽¹⁾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吐蕃王朝的整个发展过程有以下两个显著的特点：

一、吐蕃王朝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向外进行的一系列强大的武力扩张来得到实现的。在整个吐蕃王朝时期，这种武力扩张几乎从未间断并与王朝相始终。这种武力扩张不但为其带来了地域的扩展和源源不断的巨大物质利益，而且也使其与周边文明地区之间无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发生了广

泛的联系和交融，并从中得以摄取营养来满足自身的发展需要。因此，向外进行武力扩张可以说是吐蕃王朝得以不断强大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吐蕃王朝的扩张主要呈现了一种东向扩张趋势。这既表现于吐蕃王朝向外发动的扩张战争绝大多数是以东部方向的唐朝为对象；表现于在所有周边国家或政权中以吐蕃同东面唐朝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最为密切；同时也表现于吐蕃王朝向外扩张的结果主要导致了其版图的东向扩展。

那么，为什么吐蕃王朝的发展会主要以一种向外的武力扩张形式来进行并主要呈现了东向扩张的趋势？无可否认，吐蕃王朝向外扩张之所以主要呈现一种东向趋势乃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对于地缘因素在吐蕃王朝东向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笔者已撰文进行过讨论并引起了藏学同行的兴趣。⁽²⁾但是，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即从吐蕃向外发动扩张战争尤其是连续不断地向东部唐朝发动扩张战争的目的和所取得的效果来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促使吐蕃王朝不断向东进行武力扩张的另一个重要的内在动因，则来自于由唐朝代表的中原文明对它所形成的强大凝聚力。下面，本文拟着重就构成吐蕃王朝东向扩张的中原凝聚力因素作一初步的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

首先我们必须看到，从公元7世纪初到9世纪中叶，吐

蕃王朝向外所进行的一系列军事扩张，本质上乃是谋求自身发展的一种需要。而这种需要，客观上又是由吐蕃自身所处的地域环境及其文明水平所决定。吐蕃地处青藏高原的主体地带，其所面临的高原环境气候干燥严寒，土地贫瘠，“物产寡薄”，自然条件十分严峻。这种严峻、贫瘠的自然环境不仅无法满足一个新兴王朝日益增涨的物质利益需求，同时也严重制约了吐蕃文明本身的发展水平。因此，这种局面决定了吐蕃王朝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对周边发达文明地区的向心力，并采取一种向周边发达地区靠拢和倾斜的发展态势。尤其当西藏高原在政治、军事上趋于统一和强大之际，这种态势往往就愈加强烈，并主要以向外的军事扩张形式体现出来。向外进行军事扩张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打破地域的限制，向周边更高的文明地区摄取营养以满足自身的发展需要。所以，吐蕃向外的军事扩张方向必然朝着周边诸文明地区中发展水平最高的文明地区进行，即朝着最有利可图的方向进行。

另一方面，吐蕃王朝具体向哪一个方向扩张，往往还直接取决于该方向上的文明是否能对它形成足够的影响和凝聚力，取决于周边文明对它的牵引力。在公元7世纪初，环绕于吐蕃王朝外围的南亚、中亚和中原三大文明地区，因其各自在政权集中程度和政治、军事格局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它们各自对吐蕃王朝构成的影响和凝聚力是截然不同的。

南亚的文明主要以印度为代表。印度自公元5世纪笈多王朝衰落以后，其地即分裂成许多小国，小国之间各自为

政，彼此不相统属。至 6 世纪末，德里北方的小国坦尼沙逐渐强大，战胜邻近的小国。公元 606 年，戒日王（原名曷利沙·伐弹那，后改称尸罗阿迭多，中译“戒日”）即位，国势日盛，遂不断扩张领土。史载其“练兵聚众，所向无敌，象不解鞍，人不释甲，居六载而四天竺之君皆北面以臣之”。⁽³⁾ 戒日王最终统一了北印度，并迁都恒河西岸的曲女城，称羯若鞠阇国（即汉文史籍中所称“中天竺”）。戒日王曾一度向南印度扩张，但遭到失败。戒日王在北印度所建立的统治，实际上只是以众多藩属的臣服为基础而组成的一个松散的政治集合体。如戒日王国家境内就包括三十几个藩属，这些藩属都保有相当的独立，只是向戒日王称臣而已。所以，当 647 年戒日王去世，大臣阿罗那顺篡位之际，其境内的各藩属便纷纷独立，割据称雄，戒日王在北印度建立 30 余年的统治遂归于瓦解。此后印度北方和南方都重新陷入分裂、混乱局面。其间，各地虽先后出现过一些王朝，但大多属地方性割据王朝，且彼此之间纷争不断，更替频繁。如巴利哈尔王朝在 8 世纪中叶据戒日王旧都曲女城，统治恒河中游大部地区；旃德尔王朝在 11 世纪初据西印度达哈尔。此外，在东部孟加拉地区有崇信佛教的巴拉王朝，西部有安喜尔瓦拉王朝，南部有遮娄其王朝和与之争雄的帕拉瓦王朝等。9 世纪时，帕拉瓦王朝衰落后，注辇王朝又兴起于南印度。分裂的局面从 7 世纪中叶一直延续到 11 世纪。⁽⁴⁾

可见，在 6 世纪到 11 世纪的近 500 年中，除戒日王对

北印度进行的非常短暂和脆弱的统一外，印度始终处于混乱和分裂局面，始终未形成一个统一全印的强大王朝。它的权力中心是分散的，它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也是松散和软弱的。这一状况，无疑使印度丧失了向外开拓的能力，使它远远不能对北部的吐蕃构成像唐王朝那样强大的政治、军事影响。加以地理上受喜马拉雅山脉的阻隔，不仅限制了吐蕃向南的发展，同时也严重限制了印度对吐蕃的影响力。因此，在6世纪末到11世纪这一时期，作为整体的印度文明，它对吐蕃所形成的影响和凝聚力可以说是非常微弱和有限的。

与印度相比，从7世纪初到9世纪，中亚的文明同样未形成稳定和强大的凝聚中心，也处于分散和相对软弱的状态。在7世纪初，西突厥汗国曾一度称雄于中亚，但公元675年，西突厥为唐所灭。而这时兴起于西亚的大食尚处于发展初期，其势力主要是向西开拓，对中亚未构成大的威胁。因此，7~8世纪，在吐蕃西北面，即葱岭以西的中亚地区，主要分布着吐火罗，大、小勃律、康国、罽宾、个失密等二十余小国，它们大多为沙漠中的绿洲城市国家。⁽⁵⁾这些国家规模极小，在政治、军事上极不发达，国力较弱，所以，它们的文明难以对吐蕃形成足够的吸引力。这一点，我们从吐蕃在7世纪初到8世纪初的百余年时间里主要向东方强大唐朝版图进行扩张，而将这些垂手可得的中亚小国弃之于不顾也可得到证明。8世纪中叶，吐蕃始西攻小勃律，将中亚二十余国收为属国，但其目的也只是为了与唐争夺西域，“假道攻四镇尔”。⁽⁶⁾此后，因唐与大食在中亚展开

角逐以及大食的西侵，也进一步遏制了吐蕃向中亚的发展。很明显，在公元7~9世纪，与吐蕃西北境相接的中亚地区，由于未形成一个统一、强大的王朝，主要为众多分散、弱小的小国，且文明的发展程度不高，因此它们不仅难以对外界构成强大影响和凝聚力，反而不断成为各种外来势力角逐和争夺的场所。

二

同印度和中亚两大文明地区相比较，在7至9世纪，吐蕃周边发展水平最高、最具凝聚力的无疑要算东部以唐王朝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唐王朝是在结束中原长达四百余年的分裂局面后出现的一个空前强大的王朝，它不但是当时整个东亚地区疆域最辽阔、人口最多、国力最强盛的一个泱泱大国，而且还以其悠久、发达的文化和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成为当时亚洲最重要的文明中心之一。唐王朝作为中原文明核心的这种强大地位，它的富庶、高度发达的文化以及所拥有的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注定它必然要对与之相接而又竭力想打破地域限制，向周边发达文明地区摄取营养来发展自己的吐蕃王朝产生强大的影响和凝聚力。

唐王朝对吐蕃的凝聚力，从唐蕃关系一开始，就表现得非常突出。吐蕃初年，在寻求与唐朝的关系，尤其是在寻求与唐朝的和亲关系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极大的主动，就是这种凝聚力的一个充分体现。7世纪初，新兴的唐王朝即以其强

大的政治、军事实力迅速将势力伸向了吐蕃的周边外围地区。武德七年（624年），唐“以白狗等羌地置维、恭二州”，⁽⁷⁾“及贞观初，诸羌归附”，⁽⁸⁾不久，党项羌归附，唐“以其地为懿、嵯、麟、可三十二州，……于是自河首积石山而东，皆中国地”。⁽⁹⁾同时，唐朝还向吐蕃西南隅的松外蛮发起进攻，当地部落也纷纷归附。唐朝势力从几个方向向吐蕃的迅速逼近，对尚处于发展初期的吐蕃王朝形成了强大威慑，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吐蕃不得不采取向唐靠拢的策略。这正是贞观八年（634年）吐蕃主动遣使至唐朝聘问的原因和背景。而当时，正值唐朝大举进攻吐谷浑前夕，为了让吐蕃保持中立，唐朝对吐蕃采取了抚慰政策，遣使臣冯德遐随吐蕃使臣到逻些报聘。紧接着，在贞观九年（635年），唐朝即派大军一举征服吐谷浑，将其变为属国。为加强与吐谷浑的臣属关系，唐又应允了其首领的请婚要求。

吐谷浑被唐征服及与唐的联姻，无疑使吐蕃受到极大震撼。所以，在贞观十年（636年），吐蕃迫不急待地遣使向唐朝请婚。但遭到唐朝的拒绝。因为当时唐朝在征服吐谷浑后，它的主要目标是要急于经营西域，打通中亚陆路交通，因而唐蕃关系短期内对唐朝并不显得十分重要。唐朝的拒绝，使吐蕃恼羞成怒。为达到与唐和亲的目的，吐蕃随即向东部唐的属地发起了两次进攻，力图以示威方式达到目的。一次是向东北攻击吐谷浑；接着又在东部方向“进兵攻破党项及白兰诸羌，率其众二十余万，顿于松州西境。遣使贡金

帛，云来迎公主。又谓其属曰：‘若大国不嫁公主与我，即当入寇。’”⁽¹⁰⁾从吐蕃迫不急待并不惜采取军事冒险行动向唐请婚的态度，足以表明吐蕃向唐请婚绝非一时的轻率之举，而是与吐蕃的生存和发展利害攸关的一件大事。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吐蕃急于向唐请婚，大约有两个主要目的，其一，随着其东部的党项、白兰诸羌、东南隅的松外蛮及东北部强大的吐谷浑都先后纷纷归附于唐，成为唐的属地，吐蕃已越来越感到东部来自唐朝的巨大的威胁。为了获得一种安全的生存环境，同时也为了争取更有利的发展地位，吐蕃迫切需要与唐建立某种形式的结盟，而联姻在当时实为一种理想的结盟方式。其二，在吐蕃眼中，唐朝作为东亚文明中心的强大地位从来为吐蕃所瞩目。况且在7世纪初，唐朝正值贞观盛世，处于向外开拓的全盛时期，在周边邻近诸部中声威显赫。当时，“西北诸蕃咸请上（指唐太宗）尊号为‘天可汗’”，⁽¹¹⁾并均以与唐的联姻为荣。是时，吐蕃立国不久，迫切需要借助唐的声威来提高和加强自己在西北诸番中的政治声望和地位。因此，积极向唐请婚，对于松赞干布时期羽翼未丰的吐蕃王朝来说既是一种生存需要，也是谋求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手段。也就是说，唐王朝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从一开始就对吐蕃形成了一种凝聚力。使它不得不采取向唐靠拢和与唐结盟的方式来寻求有利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事实证明，吐蕃以军事冒险所争取到的贞观十五年的唐蕃和亲，对吐蕃的发展和强大的确起了关键性作用。在唐蕃和亲以后，吐蕃不仅解除了东部来自唐的威胁，而且得以借

助唐的声威和名义采取向南和向北经营的战略，先后收尼婆罗为属国，北攻龟兹，南掠天竺，逐渐壮大和积蓄了力量。随后又巧妙利用与唐的和亲友好关系，在未招致唐出兵干预的情况下，征服白兰、灭掉吐谷浑，从而最终具备了与唐朝相抗衡的实力。⁽¹²⁾

在整个吐蕃王朝时期，虽然吐蕃与唐的联姻只有两次，但从汉文史籍的记载来看，吐蕃向唐请婚的次数却多达 10 余次。⁽¹³⁾ 吐蕃频繁向唐请婚，除了出自对唐朝文化的仰慕之外，显然还包含了政治上的目的，即企图通过与唐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来获取更多的政治、军事、经济乃至文化上的利益。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吐蕃频繁地向唐请婚的要求，正是唐王朝对吐蕃凝聚力的一个充分体现。

唐王朝的富庶和发达的经济同样对吐蕃构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并成为促使其东向发展的重要原因。毫无疑问，吐蕃的军事扩张带有很大的经济目的，即力图通过向外的军事扩张来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以满足自身日益扩大的物质利益需求。因此，吐蕃王朝的扩张具有明显的掠夺性质。由于当时唐王朝财富丰饶，经济发达，它自然成为吐蕃的主要掠夺目标。这在吐蕃对唐朝发动的一系列扩张战争中表现尤为突出。《资治通鉴》载“每岁积石军（陇右）麦熟，吐蕃辄来获之，无能御者，边人谓之‘吐蕃麦庄’”。⁽¹⁴⁾ 这种以经济掠夺为目的的进犯，在吐蕃发动的对唐战争中占有很高比例。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吐蕃每一次对唐进攻得手，几乎都无不伴随对唐朝财富的大规模掠夺，如 786 年（唐贞元

二年），“八月，吐蕃寇泾、陇、分、宁数道，掠人畜，取禾稼，西境骚然”。⁽¹⁵⁾ 787年，吐蕃大军攻陷分、泾及连云堡等地，“驱掠连云堡之众及分、泾编户逃窜山谷者，并牛畜万计，悉其众送至弹筝峡，自是泾、陇、分等贼（吐蕃）之所至，俘掠殆尽”。⁽¹⁶⁾ 尤其是763年吐蕃攻入长安“剽掠府库市里，焚闾舍，长安中萧然一空”。⁽¹⁷⁾ 吐蕃通过连岁不断的向唐进攻，获得了大量财富，史载“唐地财富丰饶，于西部各地聚集财宝贮于瓜州者，均在吐蕃攻下之后截获，是故，赞普得以大量财物、民庶，黔首普遍穿着唐人好绢帛矣”。⁽¹⁸⁾ 《旧唐书·郭子仪传》亦载“（吐蕃军）近入内地，称四节度，每将盈万，每贼兼乘数四”。⁽¹⁹⁾

除对财富的大量掠夺外，吐蕃在对唐战争中还大量掠夺汉族人口。纵观整个唐蕃战争过程，吐蕃从关内诸州大掠汉人的记载不绝于史，几乎每战必掠，动辄以千、万计。如“永泰元年（765）九月，吐蕃大将尚息结，赞磨，尚息东赞及与重英等十万众寇奉天、醴泉等县，大掠居民，男女数以万计，焚庐舍而去”。⁽²⁰⁾ 特别是建中元年（780）以后“……吐蕃既得河湟之地，土宇日广，……故得河陇之士约五十万人，以为非族类也，无贤愚，莫敢任者，悉以为奴仆”。⁽²¹⁾ 对这些被虏掠或因其土被占领而沦为吐蕃子民与奴隶的汉人，吐蕃视身份的不同大体有这样几种处置：

第一种，具有专门技术的汉人，即所谓百工以及僧侣，通常是被送往吐蕃本土。特别是汉人百工，他们作为发展吐蕃手工业的一支生力军，往往受到吐蕃统治者的重视，本人

也能获得较好待遇。《旧唐书·崔宁传》卷 107 载“戎酋诫其众曰‘吾要蜀川为东府，凡伎巧之工，皆送逻娑（今拉萨），平岁赋一缣而已’”。吐蕃攻陷长安时，也曾打算将城内工匠全部掠走，史称“初，吐蕃既立广武王承宏，将掠京城士女工匠，整队伍还蕃，及是，闻鼓声，谓有变，乃狼狈奔溃。”⁽²²⁾ 虽未获成功，但由此足可窥见吐蕃对汉人工匠的重视程度。

第二种，对有文化知识和有能力的汉人，也给予较好待遇。《因话录·谭可则条》载“粗有文艺者，则涅其臂以候赞普之命。得华人补为吏者，则呼为舍人。可则以晓文字，将以为知汉书舍人”。此外，也启用一部分有能力的汉人在基层地方机构中任职，敦煌卷子中反映的即有不少“汉人部落使”，“汉人千户长”，“汉人都督”，“汉人节度使”等官职。

第三种，对汉族士女及普通百姓，则主要安置在河陇地区一带，将他们变为吐蕃治下的农业人口，向吐蕃交粮纳税。王建《凉州行》一诗写道（吐蕃）“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反映吐蕃将掠来的士女大量嫁与河陇蕃兵为配偶的情况。吐蕃从汉地掠夺来的主要是健壮丁口。如贞元三年（787 年），吐蕃在华亭及连云堡一带所掠数千人，就是“收丁壮弃老而去”。⁽²³⁾ 这些掠夺而来的汉族丁壮与沦陷区的汉族普通百姓一道，成为吐蕃统治下河陇地区的主要农业人口。由于他们有着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并长期在吐蕃的统治下从事农业生产，从而有效地推动

和促进了吐蕃农业经济的发展。唐诗“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驱羊亦著锦为衣，为惜毡裘防斗时，养蚕缫茧成匹帛，那将绕帐作旌旗”。⁽²⁴⁾就正是这一情况的生动写照。

从上述吐蕃对虏掠的汉族人口所作的几种不同使用，可以看出吐蕃对汉族人口的掠夺包涵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它既是对汉区先进手工业技术的掠夺（对汉人工匠的掠夺），又是对汉文化的掠夺（任用有文化知识的汉人为舍人）；既是对汉区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及其劳动力的掠夺，同时也能满足吐蕃在新占领区发展和增殖人口的需要（将汉族士女嫁与河陇蕃兵为配偶）。由此可见，吐蕃在对唐朝发动的战争中有很大的利益可图，它不仅通过战争直接掠夺唐朝的大量财富，而且还能对唐朝人口的掠夺，获取了唐朝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手工业技术，获取大量的劳动力以及满足自身增殖人口等方面的需要。这些利益对于保障吐蕃的发展以及维系其已经获得的强大地位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认为这些巨大的经济和文化利益也正是促使吐蕃王朝始终不断地对唐用兵的一个本质原因。有利可图，既是吐蕃对唐用兵的动机，也是它对唐用兵的目的。因此，以吐蕃一方为主动的长达二百余年之久的唐蕃战争，实际上正是以唐朝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对吐蕃文明凝聚力的一个充分体现，这也正是唐蕃战争的真正实质。

唐王朝对吐蕃的强大凝聚力，同时还在吐蕃对唐朝频繁的通使上强烈地表现出来。整个吐蕃王朝期间，唐朝向吐蕃